

国内外口述史学研究回顾

侯 儒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要】口述史学又称为口碑史学。它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专门的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是以访寻史实为目的,以采访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音为基础修改而来的纸质文本。对中外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进行梳理,回顾中外学者们的重要学术成果,有助于读者清楚了解口述史学发展脉络,同时对丰富历史学科建设也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史学;口碑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37-04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17.04.016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这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发布。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

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缪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

【收稿日期】2017-03-01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家族式传承口述史研究——以吴氏家族为个案”(2016—Q06)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口述史研究”(13CZW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侯儒(1987—),女,黑龙江抚远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

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 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 年和 1987 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70 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 60 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 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众多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 世纪 70—80 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 200 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 80 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 9 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

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筭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 年第 1 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 1987 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 世纪 80 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 90 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 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 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 30 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 1 000 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 500 余份。^[9]2003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 1999 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羨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

近4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受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驢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

(下转第47页)

略,应该坚持科学化发展路线。结合以往经验和教学,科学发展命题具有突破性。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党执政能力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要不断强化党建制度创新力度和方法创新力度以及理论创新力度,在拓展各项渠道的同时,有效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特殊时期内的党建模式、方法及内容等均存在差异性特质,此现状与特定时期党核心任务和历史使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改革开放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体系,党建模式与时代步调保持一致,党建新潮流形成。较为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国情、党情相互结合,创建优质党建模式,保证我党先进性^[10]。

结束语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党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从实际角度出发,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并且要提升党建基础性工作水准。具体实践中,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相关哲学思想进行实践融入,为后续党建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全景.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J].紫光阁,2004,

(上接第39页)

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

(12).

- [2]冯杰.国有企业如何加强党的建设[J].经营管理者,2017,(1).
- [3]张艳,陆人杰.新媒体背景下医院党建工作的探索[J].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17,(1).
- [4]韩强.五大发展新理念与党的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
- [5]郭亚丁.党的建设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价值[J].党政视野,2016,(Z1).
- [6]王伟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J].紫光阁,2009,(10).
- [7]王荣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党的建设提出了哪些新课题(续)[J].共产党员(河北),1994,(3).
- [8]柳红.企业党的建设问题及对策思考[J].办公室业务,2015,(12).
- [9]齐卫平.论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历史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兼析非科学化的思想表现[J].理论探讨,2014,(2).
- [10]储霞,孙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J].沈阳干部学刊,2013,(2).

[责任编辑:褚永慧]

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大学,2008.
- [2]张广智,陈垣.口述史学[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 [3]罗小红.落叶归根:台湾老兵口述史个案研究[D].中南大学,2010.
- [4]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90.
- [5]唐德刚.传记文学45卷[M].传记文学社,1984.
- [6]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 [7]J·福克斯、黄育馥.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J].国外社会科学,1981,(1).
- [8]箐舜.口碑史学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1986,(8).
- [9]姚力.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N].北京日报,2010-01-04.
- [10]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
- [11]罗小红.落叶归根:台湾老兵口述史个案研究[D].中南大学,2010.
- [12]孙庆忠.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责任编辑:秦超]